



作者说

我为什么要抄1912年的《申报》

□杨早

我小时候,如果被问到想生活在哪个年代,百分之百会说是“2000年”——那时总被教导,到2000年我们就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了。

后来我知道了汤因比,知道他渴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纪的新疆,因为那里是佛教文化、印度文化、希腊文化、波斯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。

我还记得刘东当时在《读书》上提及汤因比这段话,其实是为了介绍谢和耐的《蒙元入侵前夜의 日常生活》。刘东说,如果让他选,他愿意回到南宋的中晚期,因为那是汉文化发展最圆熟,最高潮的时期。

这等年份,回去则甚?

人各有志,我在2012年选择回到一百年前,1912年。当然还没人给我提供真正的穿越途径,我回去的方式是抄一百年前的《申报》。每天抄同日不同年的新闻,深深地假想自己是1912年的普通人,依靠媒体的报道与描述,构建自己想象中的中国与世界。

从普通人的角度看,这个年份并不好。1911年夏,江南大水,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省遭灾严重。10月武昌事变,大部分省份都有局部战争。

住在上海租界里算好了吧?可是米价飞涨,从七元一石涨到了十元十一元,不得不从湖南紧急调米30万石往江南救灾。

政府不得不通过报纸大声呼吁,劝上海人改变饮食习惯,多吃面,少吃米饭。

好不容易南北统一了,新生共和国又碰到两大问题:一是辛亥内战中招募的军队必须裁减遣散,二是国库空空如也。前者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当微弱,各地不断发生兵变;后者则仍是晚清的老矛盾“借债还是收捐”,以应对迫在眉睫的财务危机。

所以你看当时的报纸上,不管是新闻报道,还是社评清谈,甚至普通读者投稿,文字里都充满了焦虑之情。

就日常生活来看,1912年比1911年还要苦焦。自古烟花繁盛之地的苏州,不断传闻有商铺租户因生意冷清生活无着而悬梁自尽;而六朝金粉的南京,一片萧条,连秦淮河的画舫都开始卖酒菜便酌,大概是自洪杨之乱后未有的景象。



知道我们的习俗、想法、制度、社会架构源自何处,如何变化至今,解决不了“往何处去”的当下焦虑,却可以让人有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与通透感。

更令人揪心的,是从辛亥便开始的边疆危机。日本窥视满洲,俄国觊觎外蒙,英人进逼西藏、云南,这都是清朝治下的旧危机。总之,内忧外患,集于一身,民生凋敝,触目疮痍,这等年份,回去作甚?

我一向不相信历史对现实与未来有什么指导作用,但是回溯过往,乃是人类本能,就像人需要凭借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甚至味觉来确定自己身体与环境的关系。时间的流变,更是人类安妥自己灵魂不可缺少的维度。知道我们的习俗、想法、制度、社会架构源自何处,如何变化至今,解决不了“往何处去”的当下焦虑,却可以让人有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与通透感。陈寅恪诗“读史早知今日事”,大抵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从这个角度观照,1912年就变得很重要。跟1911年相比,科技全无进步,社会更加混乱,经济乏善可陈,学术亦少创新。然而,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,却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比如,从前的政治架构,是“天子牧

民”,这意味着君权神授,统治的合法性无可置疑。清末的立宪风潮,就是希望在不撼动这种合法性的前提下,改变政治的运作方式。不过,改良没有跑赢革命,清廷终于逊位寿终。既称民国,则君权神授一变而为治权民授。如何取得“人民”的拥戴,变成了统治的必要条件。

如此一来,民众对统治者的要求与监督,便与从前大不相同。

从前是“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”,对统治者的制约需要通过天人感应与伦理道统来实现;现在则可以直接表现为“舆论呼吁”“议会质询”,不管选举实践还有多少不足,民意传达还有多少偏差,人心所向,已是势不可当。辛亥年如能留下虚君,实现君主立宪,或许会有助于国难过渡,但君主一旦去除,想要重行帝制,那是政党、媒体与公众万不会答应的。袁世凯后来的折戟沉沙,就在于他看不出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的这重区别。

前面说了,媒体上充斥着焦虑之情,一方面是危机感的确越来越重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心理上接受不了这些危机:“都已经民国了,怎么还会这样?”以前忧怀国事,不妨将一切都推到朝廷腐败不思改革上去,如今人民当家作主,这种种的不如意,就难以让人容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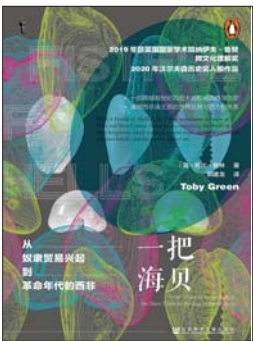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1912年,一个充斥着各方博弈,充盈着焦虑之情,也充满着无限可能的年份。第一个国会,第一个总统,第一个内阁,第一次不用叫官员“大人”或“老爷”,第一次平民可以要求面见最高统治者,第一次可以在媒体上畅所欲言,第一次中枢官员接受民意代表质询……这一切,让1912年,如居里夫人所说,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“有趣且有用”的年度。

之所以一天天一版版地翻抄旧报,而不是循着事件线索去定点查阅新闻,是因为我希望能心中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图景。

我常常设想,假如我就是一个当时的小知识分子,与权力核心隔着十万八千里,每日读报,我将如何想象这个国家、这个社会,甚至这个世界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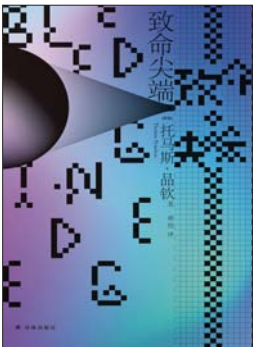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一个穿越者,在文字构成的旧世界里穿行摸索。

新书秀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「英托比·格林 著」
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
《一把海贝：从奴隶贸易

西非似乎一直处于世界的偏僻角落,不借助西方之手,就无法走出部落制与原始的阴影。然而,当英国历史学家托比·格林踏上西非这片土地,翻开落满灰尘的档案材料时,他发现真相并非如此。格林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重塑了西非诸王国的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,王国的存在建立于战争、税收、贸易、宗教信仰、权力的展示以及艺术品的创造之上。



译林出版社
蒋怡 译
「姜托马斯·品钦 著」
《致命尖端》

美国当代文学巨擘、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托马斯·品钦的最新长篇小说。从一位纽约单亲妈妈玛克欣的角度,调查互联网年轻富翁的一桩阴谋,涉及CIA的阴暗历史、纽约的俄国黑帮、各色徘徊在边缘的天才黑客。这是品钦崭新的文学尝试,也是他对当代前沿科技的反思。他探索了“深网”和极客的生活,呈现了互联网中的许多前沿科技即将洪水般涌来的趋势。



中国画报出版社
「王菲利普·格拉夫顿 著」
《玫瑰战争：英格兰王权游戏的终极对决》

1453年,英法百年战争惨败后,国家的金库空空荡荡。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,国王亨利六世隐退养病,于是他的几个最信任的盟友摄政。一段时间之后,亨利六世身体康复,但这些顾命大臣都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,而且想得到更多的权力。1455年5月,觊觎王位的约克公爵理查向圣奥尔本斯进军。第一次公开冲突在此展开,玫瑰战争爆发。历史学家及相关领域专家联手,结合大量珍贵历史图片、图表、关键人物分析等,在《玫瑰战争》中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示了玫瑰战争期间一环扣一环的王权之争,赋予诸多关键人物更鲜活的历史形象,带给读者一个更广阔新颖的视角。



上海三联书店
顾湘 著
《在俄国》

21世纪初,顾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新闻系硕士学位,本书记录的便是她在俄罗斯的三年留学生活。强烈的时代印记,清贫的留学生活,以及各种孤独、危险、无聊的境况,都被顾湘以坦诚、不遮掩的笔法一一记录下来。作者用胶片相机拍摄的照片穿插在书页之间,仿佛来自旧日时光的护身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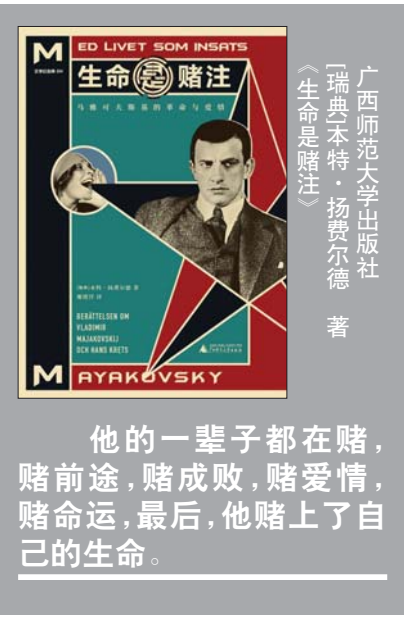
读传记

撕掉所有标签的马雅可夫斯基

□王焱

早年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,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,我觉得他只是个身上贴满各种标签的诗人,政治正确,立场先行,笔下充满了空洞的口号……尽管后来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多了几分了解,但是不能不承认,我对他的其人其诗依然存在着某种先入之见。瑞典作家本特·扬费尔德撰写的《生命是赌注》,是我读过的第一部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传记,这部传记不仅让我走近了这位一直被人为遮蔽的诗人,同时也让我真正看到了一个人性的马雅可夫斯基——骄傲的、天才的、敏感的、病态的、神经质的、挑衅性的……他是撕掉了所有身份标签的“这一个”:他是一个诗人,更是一个人。

“我灵魂里没一根头发是白的,里面老头儿的温情也匮乏!喉咙的伟力把世界震败了,我前行——美少年,二十二岁。”勇往直前、高歌猛进的美少年,这是初为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为自己所作的一幅自画像。彼时的马雅可夫斯基初出茅庐,恃才傲物,有着不可抑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预示着未来无穷尽的创作潜能和远大前程。像所有天才诗人一样,马雅可夫斯基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诗歌才能,显示出对诗歌艺术的狂热痴迷。而他本质上又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男人,一方面大胆放肆,激情冲动,极具占有欲和征服欲;另一方面羞怯自卑,脆弱茫然,把软弱的自己掩藏在粗暴的举止和傲慢的面具下,所谓的“侵略性和挑衅性”,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。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赌徒,任何事情他都可以赌一把,赌牌,赌台球,赌走过一条街需要多少步,赌街角后开出的是几路电车……他的一辈子都



他的一辈子都在赌,赌前途,赌成败,赌爱情,赌命运,最后,他赌上了自己的生命。

在赌,赌前途,赌成败,赌爱情,赌命运,最后,他赌上了自己的生命。

马雅可夫斯基生逢一个大时代——他生活与创作的时期,社会变革风起云涌,革命已是既成事实,俄罗斯帝国已经被大一统的苏联所取代。马雅可夫斯基是怀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,他愿意为这个时代脱胎换骨,愿意为这个社会奉献出自己的才华,他甚至公然宣称:“把普希金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等从现代的轮船上扔出去。只有我们才是我们时代的面貌。”然而,马雅可夫斯基本质上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,或者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,在这一点上,他的工人阶级的读者其实并没有看错他。所以尽管马雅可

夫斯基做出了进步的姿态,也的确在努力适应这个时代,但他依然难以融入这个时代;尽管他“对革命接受比任何俄罗斯诗人都更自然”,却只能游走于功利艺术与政治忠诚之间,不断地与自己的抒情本性作斗争。马雅可夫斯基更像是一个新时代的独行者,他一直想抓住一点什么,却什么也抓不住,最后只能一了百了,以决绝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。

马雅可夫斯基与莉莉、奥西普之间的“三人行”的关系,是扬费尔德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。虽然莉莉的自由恋爱理论给马雅可夫斯基带来无尽的折磨,但他们共同的生活却存在着深刻的共性,他们之间的爱情,也更多地取决于理解与默契。事实上,无论是马雅可夫斯基,还是莉莉和奥西普,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苏联是什么样子,但他们都把自己视作强有力的未来人,鼎新革故,除旧迎新,是为他们私人生活的应有之义,也是他们个人理念的一部分。正是在这种理念支撑下,他们各自保持着情爱的自由,尝试着各种不同的生活,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,他的生命的茫然已经转化为对莉莉的温存与依赖,他要的是爱的需求,他爱的是爱情本身。

在马雅可夫斯基短暂的一生中,政治与艺术,革命与爱情,既相互纠缠,难分彼此,又时时处于矛盾与冲突之中,这是他的宿命,也是他终结自己生命的原因。扬费尔德以大量当事人的讲述和记录,还原了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前数日的精神状态,以及自杀后被“封圣”,乃至被拉下“神坛”的经过,以他生前死后的命运变幻,见证时代的波流云涌。正所谓尘归尘,土归土,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三次死亡之后,扬费尔德以自己的文字让他重新复活,并最终把他还原为一个具有人性温度的诗人。